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三六期 ——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403d)

---

【文献资料】	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	
【史海钩沉】	“首都工作组”始末与辨析	
	——兼谈文革发起时毛泽东在军队的部署	丁凯文
【亲历者言】	我仿林彪字体批文件	李根清
【司法重审】	“两案”需要重新政治定性和法律纠错	文 贝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 【文献资料】

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  
——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 [ 1 9 8 4 ] 2 号

陈云同志：

我们曾是“文革”初期“老红卫兵”的成员，现在想向您反映在整党中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老红卫兵”的一些想法。

所谓“老红卫兵”，是指一九六六年夏季一些出身于干部、工农家庭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受当时“左”的路线影响而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又于同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陆续退出运动，在“文革”的中、后期一直受压抑的红卫兵。

在当前整党中，有人散布一种舆论，说什么“老红卫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

凡此种种，我们觉得同中央有关文件、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精神都是相违反的，需要澄清和纠正。否则将不利于整党，不利于清理“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

“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大多数人在“文革”各个重要阶段，表现是好的，是经住了考验的。他们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厚的感情，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较早不满和抵制，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老红卫兵”有没有缺点错误？有。首先，他们一般是学校中最早起来批判校领导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这个大方向就错了。其次，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老红卫兵”的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

整个“文革”期间，贯穿着党的各级老干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之间的殊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老红卫兵”是站在前者一边，而为后者所忌恨的。如北京中学生中的“西纠”“东纠”，大学生中的“一司”等，都是周总理和党政军老干部极力支持、引导，用以控制局势、保护老干部、维持社会秩序（如保卫国家机关、保护档案、反对过火行为等）的组织。“联动”更是为了反对中央文革而成立的。他们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前后都被中央文革压垮或镇压，打成“保守组织”或“反动组织”，其中一些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和迫害，林彪、“四人帮”还通过追查他们的“后台”来整老干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那时起，“老红卫兵”作为组织不复存在了，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长期受着压抑，在诸如反“十二月黑风”、“一月夺权”，反“二月逆流”、“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邓”、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文革”的关键时刻，从思想感情到政治态度都是与林彪、“四人帮”对立的。而那些紧跟林彪、“四人帮”，自觉充当中央文革得力工具的造反派（无论是极左派还是“策略派”），却始终把矛头对准党的各级老干部，对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积极参与各地、各部门的夺权斗争，砸机关、抢档案、打派仗，制造武斗，揪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对老干部搞“专案”和进行所谓“群众专政”，围困中南海，组织批斗中央领导同志的各种联络站和大会，窃取、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等等（当然，对这些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应根据党的政策和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区别对待）。两相比较，“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动、组织及骨干，与他们这些造反派的组织及其骨干，在性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把“老红卫兵”说成是“造反派”，势必把水搅浑，转移人们对“三种人”的视线。

在“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一些人也有打、砸、抄行为，如打了当时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如“地富反坏”、流氓等），抄了那些人的家，砸了当时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如一些寺庙、某些商标等）。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时间很短暂（个把月左右），我们认为大多属于一般性错误。当然，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如个别打死人的，如果过去没处理过，也必须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但这不能与“三种人”的打、砸、抢混为一谈。我们理解，所谓“三种人”，无论其中哪一种（包括打、砸、抢分子），都是以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为目的，都首先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文革”初期，“老红卫兵”中少数人由于年幼无知，搞了一些打、砸、抄的事情，并不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问题。如果把这类问题列入“三种人”问题，实际上就模糊了“三种人”的政治性。

“老红卫兵”和“三种人”基本是同一代人，现在大多三、四十岁。正如陈云同志指出的：谁对聂元梓、蒯大富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清楚？老同志不清楚。只有那个时候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保守派”、“逍遥派”的人才清楚，他们知道是谁整老干部的（大意）。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次整党中，“老红卫兵”虽然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

但对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缺点或一般性错误，绝不应当再予追究，对中央文革曾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更不应该再拿来做为追究他们的依据。相反，倒是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文革”中的主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以上是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

此致  
敬礼

不知当否，恳请指示。

国家经委干部、共产党员 孔丹  
冶金部干部、共产党员 董志雄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中央领导批示——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二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二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陈云 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先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阅批。然后请乔石同志将所有批语及材料印成政治局文件，发各同志。

胡耀邦 二月二十八日

李先念同志批示：  
完全同意。  
三月一日

（小平、紫阳、乔石同志已阅）

□ 原载《华远》2013年第5期

~~~~~

【百家争鸣】

“首都工作组”始末与辨析  
——兼谈文革发起时毛泽东在军队的部署

• 丁凯文 •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与解放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在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的前一天，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专职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对于这一军队方面的重要部署，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仅有寥寥几句说

明：“5月15日，遵照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为防止突发事变，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几天后首都工作组为加强首都警卫力量，进行了部队调动，并重新调整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1）同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这段文字。当时负责“首都工作组”的主要领导人是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而他们的官方版传记却完全回避了这段重要的历史。毛泽东在即将发动文革之际对军队作了如此重要的部署，官版历史为何如此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个重要的军事机构是如何产生、如何运作？它在文革初起时起了哪些作用，它又是如何消失的？这些都是文革史研究者予以特别关注的。笔者不才，愿就此问题作一探讨就教于方家。

## 一、1966年上半年中共政坛的政治形势

1966年的上半年是毛泽东精心策划文革运动极为重要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主要做了三件事。（1）在上海发起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通过批判吴晗解决北京市委、中宣部的问题；（2）军队里解决罗瑞卿问题；（3）抛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此时毛泽东的主攻方向是对准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但是却先要在外围打开突破口。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通过上海的《文汇报》发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对准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惟这一波攻击并未得到全国范围的响应，相反却受到北京方面的顽强抵制。姚文发表后的十多天内，除了华东地区几家报纸作了转载外，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报刊均保持沉默，未作转载。与此同时，知识界对姚文的蛮不讲理颇多微词。毛泽东由此认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虽然在毛泽东的淫威下，《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在月底转载了姚文，但是彭真却极力将其限制在学术领域，而非政治问题。为了乘胜追击，毛泽东的御用文人们戚本禹、关锋等在1966年1月连续发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面对这一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势，彭真领导下的“五人小组”仍然设法予以缓和。2月初，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向中央提交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刘少奇随即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并决定由彭真亲自向毛当面汇报。毛泽东虽然当面并未否定彭真的《二月提纲》，但是随后在3月份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大讲文化革命问题，明显表示出对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不满。3月底毛泽东听了康生的汇报，作了措词严厉的谈话，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和中宣部。4月份康生在中央书记处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此时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第二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对彭真作了彻底的清算。杭州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五人小组”，重建文化革命小组。彭真则在此时失去了自由。

有关罗瑞卿的问题，笔者在《找寻真实的林彪》和《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书中做了详尽的论述。简而言之，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为中央各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解放军高级将领共61人。会议集中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罗瑞卿事件的发生有以下几个主要因素：一是，由于林彪身体不好，1962年后即放手罗瑞卿负责军队日常工作，而罗瑞卿则与军委副主席贺龙的关系日益密切，军内逐渐形成两大阵营。据邱会作回忆，贺龙、罗瑞卿为一个阵营，林彪和其他老帅们为另一个阵营，在军内大比武问题上形成明争暗斗的局面；二是，罗瑞卿与其他老帅们的矛盾日显突出，尤其是与叶剑英、聂荣臻等人的矛盾尤为尖锐，再加上罗瑞卿平日行事作风强悍、霸道，得罪了很多军中人士，军内逐渐形成了倒罗的趋势；三是，毛泽东在精心策划打倒刘少奇的步骤时，必须有军队强有力的支持，罗瑞卿与贺龙如此密切，而贺龙又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关系的密切，这是毛泽东所不放心的。军队必须掌握在毛信得过的林彪手中方可无虞。上海会议后，罗瑞卿被解除了军内的职务，贺龙也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经毛泽东同意，1966年3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会议的主持人是叶剑英，与会者95人，共有86篇揭

发批判稿。罗瑞卿不堪受批，跳楼自杀未遂。作为中央工作组的负责人，叶剑英在最后的总结中列举了罗瑞卿种种“篡军反党”的罪行。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向中央送交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这说明中央认可了中央工作小组对罗瑞卿问题性质的定论。此后，叶剑英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杨成武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由此，军队内部完成了一次清洗换代的工作。一言以蔽之，毛泽东为了发动蓄谋已久的文革运动，确保军队在运动中的绝对忠诚、可靠，利用了解放军内部派系的尖锐矛盾，尤其是利用了所谓的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对军队高层采取的一次清洗斗争，成为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哨战，罗瑞卿则成为毛泽东文革运动最早的牺牲品。

毛泽东在文化界发起的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并非一帆风顺，在党内遇到相当的阻力。毛泽东由此另辟蹊径，由江青出面找到林彪，要求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1966年2月2日到20日，由江青主导召集解放军总政部分负责人开会，江青在会上声称中国的文艺界上存在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会后江青等人反复加工修改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更是多次修改增删有关内容，并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的字样，由此偷天换日地将江青召集的会议改为林彪委托江青召集会议。该《纪要》强调“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3月30日，《纪要》以军委的名义上报中央。4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6）211号文件批转至各县团级党委。事实上，《纪要》是毛泽东与江青夫妻店的产物，以军队的名义向文化界再次投出一枚重磅炸弹。该《纪要》的矛头实际上指向了彭真等人拟定的《二月提纲》，通过对整个文艺界的否定显示出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们长期以来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纪要》的发出也顺势将林彪和军队拉到毛的一方。《纪要》的出笼为毛泽东下一步发动文革运动做好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

综上所述，1966年上半年的政治形势是，毛泽东以文化界作为突破口，将其主攻对象锁定在吴晗，尤其是吴晗背后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以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扫清打倒刘少奇的前沿阵地。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精心策划，步步进逼，迫使彭真节节后退。此时的军队实为毛泽东的坚强后盾，毛既要利用军队“请尊神”，又要及时消除隐患，解决军队内部存在的种种矛盾。这个时期的军队还仅仅是毛泽东一支备用的强大力量，在毛的心目中，军队要在日后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

## 二、“首都工作组”的成立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然而，毛泽东本人却并未参加，而是由康生负责向会议传达毛近年来的多次讲话，重点是1965年11月以来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等，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号召向中央进攻的一系列指示。会议的目的是要冲垮刘少奇的前沿阵地，拿下彭真、陆定一等人，形成一个强大的声势，迫使全党接受并承认文化大革命合法性，为文革树立一套指导方针，以便全党遵照执行。惟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大权在握，但却没有安全感，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提出了要加强首都的警卫工作，“首都工作组”由此应运而生。

5月14日，周恩来邀请叶剑英到中南海自己的住所西花厅，商讨如何加强首都的警卫工作。商量的结果是，尽快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解决扩建北京市卫戍区和加强北京市要害部门的警卫。周、叶二人决定选调警卫部队及配备好卫戍区的领导班子。周恩来建议，这个小组就叫“首都工作组”。〔2〕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5月15日，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周恩来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

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3）这个工作组的组成人员值得玩味。叶剑英是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杨成武是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刘志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郑维山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万里是北京市副市长，苏谦益是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值得注意的是，身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和身为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却不在这个小组之内。这些参与“首都工作组”工作的军队干部们，日后在文革初期的政坛上都得到了重用。比如，刘志坚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李雪峰接替彭真成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兼北京军区第一政委，郑维山接替杨勇成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则出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首都工作组”虽然成立了，但还必须有一个常设的办事机构。周恩来决定成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5月19日，周恩来找来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谈话，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杭州会议批判彭真的情况和毛泽东在上海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谈话内容。周恩来向他们交待了任务：“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中央已经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现在需要组织一个精干的小班子，叫‘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首都工作组直接领导下，负责选调部队，加强北京卫戍区，保卫首都安全。”周恩来特别强调：“这件事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的，很紧急，因此一要抓紧，二要严格保密。人不要多，几个就够了，要可靠、精干。”（4）这一办公室随即在5月20日成立，共计9个人，进驻京西宾馆主楼第12层。

5月21日，王尚荣在京西宾馆召开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第一次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王尚荣强调：“这既是一项军事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都是做军事工作的，但是一定要突出政治。”雷英夫则具体介绍了工作组的主要任务：“由周总理亲自抓这项工作，他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首都工作组’组长是叶帅，副组长是杨成武代总长和谢富治副总理。”“今天我们组成的这个办公室，是首都工作组的常设机构，在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的直接领导下，完成保卫首都安全的各项具体工作任务。”“今天我们组建的这个办公室，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办公室，而是在总理和叶帅直接指挥下，完成加强首都警卫任务的一个指挥部。当前的任务是选调部队，下一步是勘察和确定重点保卫目标，部署警卫兵力。”（5）“首都工作组”的这个名称甚至都不能泄露出去，这个办公室对外只称“编写组”。

毛泽东为何要在此时匆忙成立这么一个“首都工作组”？他的真实用意何在呢？毛泽东在下决心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拿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时，并非毫无顾忌。虽然军队掌控在林彪、叶剑英的手上，但是毛仍然对北京的政治环境不太放心，不愿轻易从外地回到北京。吴德对此曾回忆说：“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前，毛主席不能回来。”（6）周恩来在1967年1月21日的一次谈话中也说：“去年三、四月份罗瑞卿的问题被林副统帅揭发出来，后来彭真的问题也揭发出来了，首都安全问题也被提出来了。主席上半年没回来，就是因为不安全，主席在北京总的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7）由此可见，“首都工作组”的成立并非是针对“外敌”，而是针对“内敌”，毛泽东在部署针对党内同仁的重大政治斗争时要绝对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是毛成立“首都工作组”的初衷。

### 三、“首都工作组”初期的主要工作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第一项实施的工作就是调兵遣将。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为了在毛泽东回京之前完成选调部队的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

下，很快就拟定了一份初步方案：（一）原中央警卫师改称为警卫第1师；（二）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编为警卫第2师；（三）调第24军的第70师作为警卫第3师，仍住怀柔地区；（四）调第63军的第189师作为警卫第4师；（五）卫戍区领导机关相应扩大编制。周恩来很快就同意了这份方案。

5月26日下午，“首都工作组”为了保密居然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茶炉室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人有周恩来、叶剑英、李雪峰、谢富治、郑维山、刘志坚、王尚荣、雷英夫等人。会议就调兵方案达成共识，周恩来最后说：“今天的会议，研究和决定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就这样定下来。卫戍区司令员拟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傅崇碧同志担任。”叶剑英最后强调说：“北京卫戍部队的调动是一件大事，不能马虎，要按原则办事，按军委关于军队调动的规定执行，要有严格的程序。今后遇有紧急情况，需要调动警卫部队执行任务时，一定要经总理批准。”（8）

据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回忆：5月27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北京卫戍区部队扩编的命令，自6月起，将首都警卫师和北京公安总队及陆军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6月15日，军委又电令第二十四军第七十师自6月3日起调归北京卫戍区指挥。首都警卫师和北京公安总队番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一、第二师，第七十、第一八九师番号不变。北京卫戍区扩编后，首都工作组对卫戍区的工作作出如下部署安排：6月10日前完成保卫重要目标的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6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师、团干部及保卫重要目标的连队的干部调配；6月中旬大体完成所有卫戍部队的调整。卫戍区部队受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党委领导，具体任务按照周总理、首都工作组和叶剑英的指示办。（9）

林彪作为主管军队的军委副主席却很少过问“首都工作组”的工作，惟这次在北京调兵遣将，扩编卫戍区的兵力，兹事体大，林彪也不能不重视。据邱会作回忆：在调动部队时，林彪特别嘱咐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选卫戍区部队的条件是要同你（指杨成武）有浓厚感情的部队，能够指挥自如，十分踏实的部队。”（10）林彪此时向杨成武说出了毛泽东的心里话。林彪的思想很明确，这支部队必须绝对服从上级的领导，绝对效忠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而非他人。惟林彪的表态仅此而已，并未参与“首都工作组”的实际工作。

6月3日，京西宾馆召开了北京卫戍区营以上干部大会，杨成武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扩编北京卫戍区的命令，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代表卫戍区全体官兵宣誓：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安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讲了话。（11）叶剑英在讲话中说：“担任首都卫戍任务的部队，同野战部队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小分队执勤和一两个人分散执勤的情况比较多，接触的环境比较复杂，会遇到资产阶级各种各样的诱惑和攻击。所以，必须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管理教育，把工作做到基层，做到每个战士的心上。林彪同志提出，在战斗中要发扬孤胆精神。今天在城市里执行警卫任务，我们要提倡孤忠执勤。在任何情况下，要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要成为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忠心耿耿地愉快地完成任务。”（12）

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共有4个师，每师6个团，加上一个独立团，一个军乐团，一个干部大队，级别为兵团级。举凡中央开会，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省委书记一级的人参加，卫戍区司令员和政委也要参加。文革期间，卫戍区人数达10万人。后来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高碑店的112师，天津的196师，宣化的193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卫戍区调动。由此可见，北京卫戍区在中国政坛的位置举足轻重。

又据《周恩来年谱》记载，6月5日，周恩来就中南海、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问题约周荣鑫、李质忠、童小鹏、汪东兴谈话，做了具体的布置和指示。（13）事实上，周恩来在“首都工作

组”中起了核心的领导作用。据参与“首都工作组”工作的邱会作回忆说：“‘首都工作小组’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定时定点的办公。我们多在京西宾馆的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首都工作小组的工作非常保密，因为要用钱，周恩来总理特地向我交待：‘这事不能转手办，你自己亲自管着，用多少，直接向我（周）打交道，不要惊动别人。’”（14）

通过北京卫戍区的这次调兵遣将，北京地区的军队系统统一由卫戍区领导，归中央军委和北京军区指挥，军队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林彪、叶剑英和杨成武的手上。毛泽东完成了对北京地区全面的军事掌控，毛泽东可以放心大胆地为所欲为，为他下一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推动文革运动的执行奠定了稳固和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充分发挥了其运筹帷幄、滴水不漏的行事风格，将毛泽东嘱意所办之事处理得既隐秘又完满，向毛泽东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首都工作组”实施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清理整顿首都的治安，消除安全方面的隐患，确保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

曾参与“首都工作组”具体工作的邱会作回忆说：“对首都安全的任务暂定了两项：（一）制定对首都的设防、警卫、主要目标控制的方案；（二）准备对首都进行全面的清查清理。清查清理的对象包括社会人口、枪支弹药、电台、监狱、侨民等。为了具体进行工作，在首都工作小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勘察小组。小组成员有杨成武、邱会作、汪东兴、万里（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李静（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等，杨成武为主持人。勘察小组对北京城进行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对远郊区曾经勘察过的有：南口、紫金关两个中央首脑指挥工程；房山、长辛店的广播发射台和劳改农场、秦城监狱等。对近郊区曾经勘察过的有：玉泉山（毛主席住地，中央战时指挥所），象鼻子沟（国务院战时指挥所），西山（中央军委战时指挥所）；还勘察过密云、顺义、通县、长辛店等处卫戍区部队的外围部署地区。对城内曾经勘察过的有：电视大楼、电讯大楼、地下污水道和中南海周围的高层建筑。电讯大楼屋顶上，距离中南海毛主席住房直径只有几百米，肉眼看得很清楚。我们就在楼顶开会，研究过对中南海的保卫和安全问题。”（15）

据参与勘察工作的张民回忆，6月上旬开始“首都工作组”对北京各重要的警卫目标进行实地考察，明确各部队的具体警卫工作。这次勘察先城区后郊区，首先勘察了广播电台、电视台、中南海周边的高大建筑物，外国使领馆。接着又勘察了广播电台的发射天线、危险品仓库、发电厂、水库，最后勘察监狱和劳改农场。在勘察过程中，了解有关情况，现场研究解决各种问题，当场决定兵力部署，并提出注意事项和有关要求。（16）

“首都工作组”在6月6日后从京西宾馆搬到中央军委所在地三座门，有关工作全面展开，人员也增加到二十多个。此时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下设七个组：（1）部队指挥组，主要负责警卫部队的调动，首都重要目标的警卫；（2）治安组，主要负责社会治安工作，清除和整治各种不安全因素；（3）枪支弹药清查组，主要负责对军队、地方和市民非法枪支弹药的清查和收缴工作；（4）电台组，主要负责对地方团体和民间各种无线电收发机的清查、整顿工作，特别是对私设电台的清查、清理和收缴工作；（5）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主要对非法居留北京和危险人口的清查、整顿工作；（6）监狱、看守所组，主要负责北京市各监狱、劳改场、拘留所和看守所临时关押人员的安全警戒和清查、清理和整顿工作；（7）外事、侨务组，主要负责各国驻京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安全警卫工作，负责北京华侨的清查和安全生产工作。叶剑英则亲自参加领导工作，周恩来也多次就有关工作作过指示。（17）周恩来在1967年1月21日接见科学院京区各单位代表时说：“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搞四大、搞大串连，就有秩序，既有民主又有



集中，首都警卫部队要加强，要保卫中南海、钓鱼台、人大会堂，保卫首都的机要地点、电台、尖端要害部门，要保卫首都的安静，要把过去公安、保卫系统掌握的地、富、反、坏分子清洗出去。”〔18〕

#### 四、文革期间的“首都工作组”

在完成调兵遣将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之后，“首都工作组”很快就陷于事务性的工作。据参与该工作组的张民回忆，日后的工作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协同北京卫戍区为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搞好组织指挥和安全警卫工作；二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保护一批老干部、民主党派人士、科学家等；三是维持好首都的秩序，使首都不致发生重大的动乱事件。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林彪一同出席。“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除留一人在三座门看家外，其余全部到天安门城楼值班和参加现场工作，大会的警卫工作即由“首都工作组”和北京卫戍区共同担负。现场的参谋人员在临时的作战值班室完成了通讯系统的检验，并与军内各重要部门取得联系和沟通。这次庆祝大会实际上成为毛泽东第一次对“红卫兵”的接见。

“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后，“首都工作组”又马不停蹄地为毛泽东组织了以后多次的检阅红卫兵活动。比如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时，“首都工作组”提出的方案之一是，50万红卫兵排列在天安门广场，由毛泽东乘敞篷汽车检阅，再登上天安门城楼，以接见大会的方式完成整个接见过程。由于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组织方面存在“散”和“乱”的严重问题。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组建了八个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下面分别编组若干个团、营、连。各大“联指”分别由北京军区、总后、海军、空军、各兵种等单位抽调干部组成。“联指”的总指挥由师以上首长担任，其他团长、营长、连长由部队相应干部担任。另外，还从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北京市抽调干部，分别到各营、连做红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并负责物资供给，保障红卫兵的生活需要。事实证明，“联指”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各“联指”对红卫兵进行了军事化的训练，按班、排、连、营、团组织序列，由部队的干部带领，不仅加强了纪律教育，而且还严格管理，在以后毛泽东多次检阅红卫兵时，红卫兵们原来的“散”和“乱”得到有效的改进。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时，“首都工作组”在三天内筹集了6000辆卡车。当时“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几个参谋以总参作战部的名义，分别打电话从总后、海军、空军、各兵种司令部，及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抽调汽车，火速集中到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最终所调的6000辆汽车全部准时到达指定地点，保证了11月10日检阅活动的进行。

文革初起时，一些老干部被点名批判，一些人被“造反派”、“红卫兵”抓走，最早被抓的有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得到报告后，紧急报告周恩来。周通知北京卫戍区尽快将被抓走的人找回来。后来几经周折将这批被抓人士找了回来。事后周恩来指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协同卫戍区认真研究，如何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要对老干部们加强警卫工作。在中国科研前沿搞“两弹一星”的专家们在此时也未能幸免被揪斗和关押，这引起老帅聂荣臻的愤怒，北京卫戍区在聂荣臻的要求下派出军队保护这些专家的人身安全，以保障科研工作的进行。此外，一批著名的统战人士在毛泽东指示下，周恩来也通过卫戍区予以保护，如章士钊、宋庆龄、郭沫若、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李宗仁、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等。当全国各地均陷入动乱之时，惟有军队还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也只有军队能有效地执行命令，在上级的指示下有限度地保护一些老干部和重要的知名人士，保护首都的要害部门和科研机构。

文革期间，北京卫戍区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对一些老干部实施了“监护”。据傅崇碧回忆：中

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规定，一批老干部，如彭真、罗瑞卿、黄克诚、彭德怀、王尚荣、刘志坚等人被送到北京卫戍区实行“监护”。据周恩来解释：就是把他们临时看护起来，不能随便自由，同时也是保护起来，不要让造反派随意批斗。（19）周恩来的这个解释冠冕堂皇，名义上是把这些老干部保护起来，实际上就是将这些人的变相关押、审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只不过没有被送进监狱而已，实际待遇相差无几。以彭德怀为例，彭被关押在北京西郊一处部队驻地的小院，基本上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秘密监狱。除了每天反省之外，还要经常被各种不同的人带出去到各种不同的场合接受批斗，批斗会当中还多次被殴打。彭每天上下午各只有15分钟放风，身旁有军人随时监视。（20）彭德怀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却得不到必要的治疗，在那里一直被关押到死。

“首都工作组”在文革中还有一项工作就是维持好首都的秩序和安全。1966年8月底，北京某中学红卫兵把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的路牌换成“反修路”，并要在现场召开命名大会。“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并提出加强警卫力量，以免发生不测。周恩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立即采取三项措施：（1）红卫兵可以改路名，但不要在大使馆前开大会，不要把大字报贴到大使馆墙上，更不能冲击大使馆；（2）北京卫戍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徒手到现场执行警卫任务，防止红卫兵采取过激行动；（3）“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和卫戍区要派人到现场检查巡视，防止发生不测事件。如有紧急状况要立即报告。“首都工作组”在维护北京地区秩序与安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文革中的“造反”活动属革命行动，受到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这样的动乱是无法从根本上制止的，“首都工作组”对首都秩序的维护也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标不治本而已。

## 六、“首都工作组”的动荡

“首都工作组”的动荡来源于总参“八二五事件”。1966年8月22日，总参谋部在北京西宾馆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代总参谋长、党委书记杨成武作机关开展文革运动的动员报告。下午总参通讯兵部有人到总参机关所在地旃坛寺贴大字报，指责杨成武的讲话压制革命群众。此后总参的一些部、局也贴出大字报，矛头对准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

8月25日上午，毛泽东按照预定安排在钓鱼台12号楼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陪同的有总理周恩来、代总长杨成武和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国防部外事局长潘振武为引见人。陪同和引见的人还没有到场，外事局参谋孙启祥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说他代表革命群众，要求毛泽东不要让潘振武参加接见。周恩来与杨成武商量后，同意潘振武不参加当天的接见活动。（21）

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潘振武参加上述毛泽东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的的活动，而在于当天叶剑英以军委名义做出限制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多条规定，并下发全军。这些措施是针对军队自己的，只在军队内部实施。（22）

8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意见。该指示要求：

一、学生和群众到军队机关抓黑帮分子，要向他们说明，他们要斗黑帮分子的革命热情，我们表示热烈欢迎。请他们相信解放军，一定会把军队内部的黑帮分子斗倒，斗臭，斗垮。军队中的黑帮分子，由军队负责处理。他们对军队内的黑帮分子有意见，有材料，有大字报，欢迎送来。

二、各大单位可向各地党委建议，在地方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如确有严重错误缺点，应

当在所在工作的单位进行批判令其检讨，回军队以后再酌情处理。

三、军队干部宿舍有武器、机密文件和常通军事机密电话，建议地方学生不要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23）

这一指示显然与军内机关造反派思想格格不入，自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弹。

8月25日，总参作战部和国防部外事局的一些人贴大字报，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拿着质问信、抗议书等，质问代总长杨成武和潘振武“压制群众罪责难逃”等等。当天晚上，外事局的大字报贴出来了，作战部连夜开会，支持外事局群众“革命行动”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等带头签了名。此时，解放军测绘学院刘清明也贴出批判杨成武的大字报，贺龙元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亦贴出《炮打总参办公厅党委》的大字报。由此，杨成武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对于这一波针对杨成武的大字报，周恩来十分警惕，于26日亲笔写信给总参党委。周的原文是：

“杨成武同志转告总参谋部各部、局党委：

昨（25）我陪同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杨成武同志向我反映，总参外事局同志提出不要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杨成武同志同意这一要求，并向我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我同意他的意见，并于事后报告了主席。可将这一情况转告有关同志。”

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在27日也写了证明信如下：

“总参党委：

8月25日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之前，总参外事局孙启祥同志打来电话说，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我当即报告了杨成武请他决定。这时总理已到，他即向总理反映了我接外事局电话的情况，并向总理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总理当时同意了杨成武同志的意见，并及时告诉了潘振武同志不要参加了。”（24）

据在总参工作的张民回忆，王尚荣和雷英夫当时受到一批“极左派”群众的压力，并未细看大字报内容，也没有慎重考虑大字报的后果，不知道其中有攻击杨成武、王新亭的内容，就稀里糊涂地上面签了名。（25）惟这张大字报的出现引起了总参各部的连锁反应，总参各部、各局陆续出现揭发、批判杨成武、王新亭的大字报，解放军的中枢部门——总参谋部出现不稳、动乱的迹象。

8月30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在军委办公厅三座门紧急召开军委会议，萧华、张爱萍和杨成武等都到会参加。叶剑英在会议作了指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讲了话，指出王尚荣与雷英夫的做法是错误的，及时制止了事态的扩大。林彪认为仅仅批评王尚荣、雷英夫是不够的，坚持撤销此二人的职务。在31日召开的军委常委会上，林彪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并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会上决定撤销王、雷二人的职务，停职反省。不仅林彪重视军内发生的夺权活动，周恩来也十分重视。在“八二五事件”刚刚发生时，“周总理知道后很生气，很快给杨成武打来电话，询问情况，要杨提高警觉，并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26）这个看法实际上与林彪不谋而合。

发生在总参的这一事件，毛泽东本人也是了解的。1967年2月3日，毛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

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27〕

1966年的7、8月份，文革运动刚刚兴起，毛泽东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的大字报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批判，红卫兵运动也应运而生，被毛泽东掀起的文革运动开始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军队内部自然不会免俗，紧跟“伟大领袖”号召者大有人在，他们站出来批判“当权派”在当时被认为是革命行动，只是参加运动的大多数人心里并不清楚谁是“伟大领袖”心目中的“走资派”，谁又是响当当的革命派。军内一部分人批判杨成武如同前不久空军、海军一些人批判吴法宪、余立金、萧劲光、苏振华等人如出一辙。但是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林彪却是要稳定军队，不能容忍地方文革运动中的造反夺权事件在军内发生，故必须煞住军内夺权的风潮。王尚荣、雷英夫虽然是小人物，但快刀斩乱麻地撤销他们二人的职务却可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及时地制止军内任何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此外，军队的领导权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自从罗瑞卿事件后，杨成武实际上成为仅次于林彪、叶剑英的军队实权人物，是毛泽东、林彪极为信任的军队领导人，军委已经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如无毛泽东、林彪、叶剑英的同意，任何人都无法动摇杨成武在军内的地位，任何对杨成武的挑战都会被视为“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文革”的罪行。王尚荣、雷英夫等人对此不察，政治上的幼稚终于导致自己的下台。

由于“首都工作组”的正副组长皆被打倒，周恩来临时抽调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王德出面领导，然后再调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兼管“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领导工作，使之能够继续运转。

#### 七、“首都工作组”的撤销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家里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生日庆祝会，参与人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毛泽东就新的一年文革运动发出了全国全面夺权的号召。1967年初上海、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分别发生夺权运动，各地夺权也逐渐进入新的高潮。“三支两军”的工作走上议事日程，成为控制社会动乱的主要力量。

到1967年春季，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因为“二月逆流”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被迫靠边站。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在1967年1月倒台。郑维山接替杨勇成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也无暇顾及“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很早就被打倒，根本没有参加过“首都工作组”会议。更主要的是，北京政坛的焦点问题已经发生重要的变化，不再是一年前毛泽东所担心的“安全”问题了。特别是北京卫戍区的建制、扩编早已完成，与军委各总部也建立了正常的工作关系，“首都工作组”的政治使命已然完成，没有什么大事需要它去办了，而日常的军队的调动、应付突发事件等也可交由总参作战部负责处理，此时的“首都工作组”已成为多余。

1967年春，“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向周恩来呈送了一份报告，请示撤销该办公室，但周恩来有意压下没有理睬，此后该报告又多次送呈周恩来，但一直没有下文。据周恩来办公室秘书张作文说：“据我观察，周总理对撤不撤‘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问题，还在考虑，看来他想再等一等，看看还有什么新的需要没有。”直到1967年6月周恩来才最终同意撤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从此，“首都工作组”走进了历史。

#### 八、几点总结

第一，“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初衷，是毛泽东为发动一场旨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运动时在军事上做的万全准备。加强首都的警卫力量并非是针对所谓的外来敌对势力，恰恰是针对负责中

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些曾经的“自己人”。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29〕“首都工作组”成立之时处于极端的保密状态，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为了防范林彪，而是为了防范刘少奇。一言以蔽之，“首都工作组”的成立与工作就是毛泽东为确保文革运动在军事上的做的战略部署。

第二，林彪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绝非是偶然和孤立的。林彪这篇被中共官方批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明确指出：“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林彪一语道出了毛泽东的心病，点到了毛泽东暗中调兵遣将的实质核心内容。林彪这篇讲话不过就是配合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部署。林彪的特点在“说”，而周恩来的特点则是在“做”。

第三，“首都工作组”的具体工作均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进行。从调兵遣将到清理整顿北京市的治安，从负责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各项部署到对一批军队被打倒的老干部们实施“监护”，再到维持首都的秩序、治安等，这期间主要工作是由“首都工作组”与北京卫戍区共同完成，而这些主要工作的直接领导者是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等人，具体工作则是“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负责操作。周恩来实际上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得力工具，而林彪在此期间反而并未起什么作用。

第四，“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王尚荣、副主任雷英夫的倒台，并非林彪为了“篡党夺权”设法换上自己的亲信，而是及时制止军内发生类似地方造反夺权的动荡，将此类现象在萌芽时就及时予以制止。王、雷倒台后，“首都工作组”由郑维山负责就是明证，郑维山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与林彪毫无渊源。那种说林彪坚持撤换王尚荣等人是为了换上自己的人从而孤立周恩来，如非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第五，事实证明，军队介入文革运动，绝非是1967年“三支两军”才开始，而是贯穿于整个文革时期。毛泽东在1965年2月打倒了罗瑞卿，接着又端掉了彭真、陆定一和杨尚昆，扫清了打倒刘少奇的前沿阵地，而此时又在北京成立“首都工作组”，进一步加强军队部署，军队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得力工具，有了军队这个坚强的后盾，毛泽东遂在1966年8月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将文革斗争的矛头直指刘少奇。由此可见，军队在文革中的确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59—760页。

〔2〕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1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4〕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1—52页。

〔5〕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6页。

〔6〕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 (7)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0年版。
- (8)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3—70页。
- (9) 傅崇碧《傅崇碧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79—180页。
- (10)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40页。
- (11)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6—77页。
- (12)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42页。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 (14) 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 (15)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441页。
- (16)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108页。
- (17)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5—98页。
- (18)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0年版。
- (19) 傅崇碧《傅崇碧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01页。
- (20) 沈国凡《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264—269页。
- (21) 陈虹《总参“八二五”事件》，载《党史博览》1999年第9期。
- (22) 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上，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 (23)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版。
- (24) 陈虹《总参“八二五”事件》，载《党史博览》1999年第9期。
- (25)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
- (26) 陈虹《总参“八二五”事件》，载《党史博览》1999年第9期。
- (27)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版。
- (28)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38页。
- (29)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10年版。

□ 原载《新史记》第17期，2013年12月20日出版，原文题目被出版者改为《周恩来另设军事系统保卫毛泽东》，小标题也有改动。

~~~~~

## 【亲历者言】

我仿林彪字体批文件

• 李根清 •

### ◇ 林彪说“都是例行公事”

1964年10月，我从首都警卫师调到林彪办公室，给林彪当了两年内勤。1967年新年一过被调到秘书办公室，协助机要秘书于运深做文件收发管理工作，不久被军委办公厅任

命为林彪办公室保密员。关于这次工作调动，叶群同我谈话说：“首长这里的文件都是最高机密的。现在这个形势，从外边再调一个人来我和首长也不放心，所以决定叫你去管文件。你是党员，支部也认为合适。”叶群反复强调要“守口如瓶”。

我虽然离开了内勤岗位，但林彪、叶群仍然像往常一样找我去记录他们口授的东西，我也还像往常一样为林彪抄写读书卡片。

进入1967年，全国范围的内乱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每天，国内的、国外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等等，方方面面的文件、电报、信件如雪片一样飞来，还有大量群众来信和五彩缤纷的红卫兵小报。我不光要收发登记，而且对中央内部传阅文件和一些重要文件还要做内容摘要，记住它们的办理结果，以备林彪、叶群随时查询。尤其对毛泽东、周恩来批来的文件，必须及时办理，准确传递，不能出差错。

我的指导老师于运深，1950年参军，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进修，调林办前是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助理员，是搞保密档案工作的行家。在他指导下，我很快熟悉了业务。他担负起给林彪讲文件的任务后，我便能独立承担起工作任务。那几年，靠着年轻体壮，每天七点多上班，凌晨两三点钟下班，常常睡梦中被卫兵叫醒签收从中南海和国防部发来的文件，几乎24小时在工作，也不觉得累。

1967年3月的一天，我发现一份中央传阅件上，林彪的批语不是林彪亲笔所写，像是先用复写纸描出林彪字体的样子，然后照痕迹“写”出来的。因为心存疑惑，我便悄悄去问张云生：“张秘书，我看首长这个批语怎么像是描写的呢？”张云生微微一笑，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别问了，发吧。”

之后，一连十几次出现这种情况。有一天，我终于发现张云生正趴在办公桌上批字呢。他果然是用红色复写纸先描后写。他对我诡秘一笑，说：“没办法。”

姜还是老的辣。不久，张云生把这个差事推给了我。

那天，叶群来到秘书办公室，张云生拿着他批的字向叶群诉苦，说仿林彪字体怎么也仿不像，其他秘书也在旁边帮腔，说张云生仿的确实不像。叶群反问：“那么这件事你们谁来做呀？”张云生说：“这件事谁做也不好，首长的字谁也学不了。”叶群听了，似乎意识到什么，说话声音立刻提高了八度：“张云生，你那点小聪明我知道。你不要以为这是我的主意。告诉你吧，这是首长的主意，不信，你跟我去问问首长！”张云生一听立刻笑着说：“主任，我丝毫没有那个意思。我仿的确实不像，怕人家看出来对首长影响不好。”叶群说：“那怎么办呢，谁行啊？”这一问，谁也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只听郭连凯说：“让根清试试吧，他的字写得不好。”我在里屋听郭连凯这么说，心中一震，很是生他的气。我想，这是根本不应由秘书来做的事，我怎么就行呢。这时只听叶群说：“那就叫小李来吧。”

叶群见我从里间走出来，不由分说，便让张云生、于运深和我跟着她去见林彪。

刚走到客厅门外，还没有看见林彪的影子，叶群便高声叫道：“一零一呀，我让他们替你批几个字，是不是你同意的呀？”

我们三人在客厅门外站着，只听林彪应声说：“是啊，我同意的，怎么啦？”

“没什么，你休息吧。”叶群说着便又带着我们原路返回，一边走一边说：“你们都听到了

吧，不是我的主意吧。首长同意的，出了事由他顶着，你们怕什么！”

回到秘书办公室，叶群又详细交待了批字的事。她是这么交办的：秘书讲完文件后，把林彪口授的批语记下来，转告我，由我替林彪写在文件上。最后叶群叮嘱：“这件事我也担不起责任，你们做好登记吧，以后万一有个什么事，由首长负责。”

叶群走后没多久，内勤便来招呼我去见林彪。林彪见我进来，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然后对我说：“你知道的，我身体不好，一提笔批字就紧张、出汗。那些（传阅）文件都是例行公事，我同意，你就替我写。”

也许是因为体谅林彪的身体，也许是因为不敢对林彪说不，尽管我从心底不愿意承担这件事，还是习惯地点点头，答道：“行。”

回到办公室，我把林彪的话原原本本记在张云生移交给我的登记本上。自此以后，林彪在文件上要批什么话或需要签名，便由我代劳。他的批语大多数只是“呈主席阅”、“呈主席批示”、“同意”、“完全同意”这几个字，很少提出独立的意见或建议，只要把这几个字练熟了，写像了，基本上就可以应付了。

从1967年3月到1971年9月四年多时间，由我替林彪批字的文件有400多件，写满了两个登记本，绝大多数是“呈主席阅”、“呈主席批示”、“同意”等几个字，林彪授意的批语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记忆，倒是叶群让我替林彪写的批语有几件我还记忆犹新。

#### ◇ 向江青“致敬”

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外，江青是最爱批中央传阅件的一个。江青的批语往往咄咄逼人，迫人表态。林彪不爱听，秘书谁也不爱报。在秘书之间，只要一说“难题”来啦，就知道是江青又批出了传阅件。我办理江青的批件时也格外小心，与办理毛泽东、周恩来的批件一样，登记详细准确，即收即办。

由于林彪讨厌江青，一听是江青的批件就摆手，因而江青批示传阅的文件基本上是由叶群办理，只有叶群认为必须报告林彪知道的，秘书才向林彪简要说几句，生怕惹林彪不高兴。叶群常常拿着江青的批件唉声叹气，不知如何是好。不过她有一条原则，就是不第一个表态，不得罪江青，上推下卸绕弯子，总能想出办法搪塞过去。

1968年初，江青给林彪写了一个报告，提议成立中央艺术大学，自任校长。林彪不予理睬，叶群说“呈主席批示”，把球踢给了毛泽东。几天后，毛泽东把报告退给林彪，毛泽东批道：“江青不宜做此事”，把江青的校长梦打入冷宫。

林彪不爱搭理江青，叶群就自作主张，替林彪表态，林彪两次批示向江青“致敬”就是例子。

1968年3月的一天深夜，叶群从会场回到毛家湾，一进秘书办公室便急急火火地喊起来：“李根清呢？李根清！”

我来到叶群面前，只见她从一叠文件中取出两页写满字的纸，对我说：“来，你在这上面替首长批几个字吧。”



我没看清纸上写了些什么，但看出是陈伯达的手迹，上面还有毛泽东龙飞凤舞的批语和其他人密密麻麻的字迹。

“批什么呢？”我问。

叶群说：“就批‘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吧。”

听叶群说出这样的批语，我感到吃惊。我想，这可是替林彪写批语呀，怎么能这样称颂江青呢？于是，我脱口而出：“评价这么高啊！”

叶群并没有在意我这么说，只是指着那两页纸对我说：“你看看他们写的，首长的批语比陈伯达的低了不好。”

这时我才仔细看了那两张纸上的字，原来是陈伯达亲笔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信，信的内容是送阅蓝萍（即江青）三十年代写的《我的一封公开信》，江青在公开信中述说她与第三任丈夫唐纳纠葛的一些事情，诉说她对当时社会舆论的不满。在陈伯达信的落款处，除江青外，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有的人还写了批语。陈伯达在信中称江青：早在三十年代“就不愧为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已经圈阅并写了批语：“我就是由此认识江青性格的。”

叶群见我看过信，说道：“这是碰头会一致作出的评价，大家都签了名，主席也批示认可了，首长的批语不能比陈伯达的低了，你就写吧。”

我心里实在不想以林彪之名吹捧江青是“革命家”，就又说：“这几个字我没练过，是不是明天请首长批一下。”我想，如果林彪来批是断然不会写这样的话的。

叶群说：“首长已经休息了，明天就来不及了，你就快点写吧，我还得拿着它赶回会场呢！”

我只好从命。叶群跟着来到我的办公室，眼瞅着我在“林副主席”四个字上划了个圈，顺势引出一条线，写上“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欢欢喜喜地把陈伯达的信收了起来，接着又拿出江青那封公开信，悄悄嘱咐我：“你快点，把她这封信抄下来，越快越好。”我知道这是叶群耍鬼心眼，要留江青的“文字根据”，于是几分钟就把江青那封公开信抄完了，叶群赶紧收藏起来又回会场去了。

这就是叶群——“上面亲嘴，下面使绊子”，对江青也是如此。

过了半年，叶群又一次让林彪向江青“致敬”。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亲自抓刘少奇、王光美专案。1968年9月，专案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江青在报告上这么写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残、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林彪听秘书讲过这份文件后，并没有任何表态，只是在空中比划了一个圆圈，意思是同意。

按照叶群的规定，没有经过她把关，传阅文件是不能退走的。不经她认可，林彪的任何表态都没有用。所以，这份文件也必须等候叶群的最后裁决。

叶群来了，询问文件办理情况。那段时间专案材料由李春生负责报告，当叶群听说林彪只是表示划个圈时，便立即惊叫起来：“怎么不提醒首长呢！这是十一楼（指江青）亲自挂帅的专案，是中国第一大专案呢！主席非常重视，十一楼亲自抓，人家多大的功劳啊！大家都表态了，首长怎么能只划一个圈呢？”接着，叶群就喊：“李根清，过来。”等我走过来，叶群已经替林彪想好了批语：“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在江青指导下写成的关于刘少奇所谓“罪行”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戴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错误地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与此同时，林彪向制造这一冤案的罪魁祸首江青“致敬”，也被永远地载入史册。不过，应该申明的是，由我替林彪写在文件上的批语就只有那么一句。

#### ◇ “赠霍查同志”

1967年10月2日，林彪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一行。客人到了以后，郭连凯抱着一摞《毛主席语录》来找我：“老根，重要任务，快在这些语录本上批字，准备马上送给客人。”

那时，外交活动中时兴给外国友人赠送《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及毛主席像章。

“外交部不送，为什么我们送？”我说了这么一句。

郭连凯说：“这是主任让送的，你就抓紧写吧，会见很快就结束了。”说着，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霍查、谢胡、阿利亚、卡博、巴卢库等一连串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

“你就写‘赠霍查同志，林彪’，然后照名单一本一本地写。”

我心里对叶群这个做法不满，便对郭连凯说：“你也不劝劝主任，这是送外国朋友的，我替首长写算什么？”

郭连凯一听，“哈哈”笑起来，说道：“真让主任猜着了。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主任说，正是因为送外国人的，才让根清写呢，反正外国人也不认识中国字。”

没办法，我抓起红油笔，从霍查写起，一人一本，三下五除二就写完了。写完后我看了一遍，除“林彪”、“同志”四个字有点像林彪的字体外，其余都是“李体”。郭连凯二话不说，抱起来溜烟地走了。事后，他对几位秘书说：“老根真行，字都批到外国去了。”

#### ◇ “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

1969年8月9日，江青就当前文艺工作和普及样板戏问题致信林彪，要求林彪把她的信和她与姚文元合作搞的两个材料批发全国。随信附了两个材料，一个是对鲁迅《答徐懋庸》等几篇文章的《批注》，一个是对周扬关于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言论的《评注》。江青在信中说，鲁迅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识破周扬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周扬以及夏衍、田汉、阳翰笙四个人，早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回合就被称作“四条汉子”批倒批臭了。时隔三年之后，江青、姚文元又以“批”、“评”形式，企图掀起一个批判周扬关

于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言论的浪潮，醉翁之意不在周扬，而在林彪。

1968年10月26日，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当讲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地位时，林彪列举世界上曾经发生的“有重大影响的”三次文化大革命，即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意大利为首的文艺复兴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把它们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相比较，林彪说它们是“小巫见大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大巫”，前三次文化大革命是“小巫”，其“规模、深刻性小得多”。

林彪这样讲本来是为毛泽东歌功颂德，但却引起江青的不满。她在林彪的讲话记录稿上写了一些批语寄给林彪，让林彪看后转送毛泽东。她还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公然散布说，林彪把文化大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相提并论，是“贬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理论上不成熟”的表现。

江青的话很快传到林彪耳朵里，林彪大骂江青“算什么东西！”

现在江青公然拿出影射林彪讲话的材料并要求林彪亲手把它批转全国，显然是想给林彪一点颜色，表明她才是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捍卫者。

叶群从会场抱回这包材料，像是捧了烫手的山芋。她不敢硬顶江青，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对秘书说：“这是个大难题呀！你们谁去给首长讲讲啊？刚才十一楼叮嘱我，一定要首长支持她，可首长为她那句话气还没消呢，怎么会给她批呢？我真担心首长会把她顶回去。”

平时，秘书们谁都不愿意报江青的文件，一时谁也没吱声，最后于运深把“难题”接了过去。

据于运深说，他给林彪讲时，林彪接过材料看了一眼便扔在地毯上，气愤地说：“纯粹是假马克思主义。我是管打仗的，不要理睬她！”

江青的材料被扣压下来。这一点叶群预料到了，但她不愿意林彪得罪江青。第二天，叶群叫我拿着材料去见她，对我说：“这个材料不能压在咱们这儿，刚才十一楼还来电话问首长批了没有，要首长快点批。人家两个人搞了几个月，拿它当宝贝，怎么可以不理睬呢？”叶群指着办公桌上的电话机说：“这不，（江青）还等着我回电话呢！”

叶群对江青送来的难题总有破解之法。她靠在沙发上想了一会儿，抬起身对我说：“小李，这样吧，还是你替首长批几个字吧，就批‘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

当时我觉得叶群这个主意很聪明，既没有硬顶江青，也没有直接把球踢给毛泽东，又让政治局委员们看看江青、姚文元的货色，是替林彪化解了一个难题，于是就在叶群面前替林彪划了圈，然后批上了叶群交待的那句话。

政治局会议讨论那天，叶群故意躲着没有出席。据吴法宪回忆，那天只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四个人坚持下发全国，周恩来和政治局其他多数成员坚决不同意，未予通过。江青等人仍坚持下发，周恩来发了脾气，说：“江青同志，你要懂一点民主集中制，懂一点集体领导的原则嘛！对这个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只有你们三四个人同意，就硬要往下发，这样做行吗？你屡次干扰大家，大家不同意，你非要通过，这是一种分裂党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发也要经过毛主席，要经过毛主席同意才可以。”（《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51页）最后周恩来把材料报送给了毛泽东，被毛泽东扣压。

江青不肯罢手。两个月后，她把经过修改的材料又送给了林彪，并且写了一封致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信，要求林彪批发。林彪仍然像上次一样说：“压下，不必理睬。”而叶群也故伎重演，又让林彪批了“再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事先，她与周恩来电话通气，周恩来说，林彪同志无论如何不要再把江青的东西批给中央政治局，不然他不好办。叶群放下电话却说：“这个球总理不愿接也不行，还是得踢给他，明知要在主席那里碰钉子，那就让他去碰好了。”叶群果然又说中了。江青的材料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碰壁，送到毛泽东那里后又石沉大海。

毛泽东和江青可能不知道，跟江青斗法的，其实不仅有林彪，而且还有叶群。叶群利用林彪的名义，把周恩来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调动起来与江青角力。在这场角力中，林彪只是叶群手中的一张牌。

#### ◇ “完全同意主席批示”

庐山会议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总是把毛泽东、林彪的批语印在正文标题前面，用醒目的红字印着“毛主席批示：同意”，“林副主席批示：同意主席批示”；或“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发”，“林副主席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形：“毛主席已圈阅”，“林副主席批示：同意主席批示”。

这里，毛泽东的批语无可非议，林彪的批语却不伦不类。这是那个特殊年代，特殊历史背景下，林彪这个特殊人物做出的怪事。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似乎只会跟在毛泽东后面亦步亦趋。

林办的秘书都知道，这种怪事不是林彪做出来的，而是叶群的杰作。

庐山是林彪的滑铁卢。“批陈整风”开始后，林彪一蹶不振，不理政事。毛泽东把写了措辞严厉批语的文件，一份接着一份批给“林、周、康”，表面上是批陈伯达，实际上也对着林彪。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叶、李、邱作检讨，江青一伙趾高气扬，林彪更是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中。

林彪不再愿意听文件，哪怕是只批给“林、周、康”三个人的文件，秘书也报不上去，都由叶群当家处理。林彪在《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上的批语，在《中共中央转发38军党委〈关于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的通知》上的批语，在《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的通知》上的批语，在《中共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上的批语等，其实都是出自叶群之口，由我代替林彪写上去的。

有一次，于运深向我转达叶群口述的“林彪的”批语时，我忍不住向于运深提出意见：“应该提出建议，这样批，逻辑不通，不如不批。”于运深长叹一口气，说道：“我当面提过啦。主任说，你们不懂，坚持要这样批，没办法，你就这样批吧。”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是个“甩袖掌柜”，毛泽东曾批评他“想当明世宗”。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玩“林彪”如同儿戏，这是我当年看到的隐藏在毛家湾的黑暗的一角。

（作者为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政府退休干部）

□ 《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

~~~~~

## 【司法重审】

“两案”需要重新政治定性和法律纠错

• 文 贝 •

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俗称“两案”，这两个案件随着特别法庭的宣判而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治生活及社会发生了变化，加之知情者的不断披露，当年判定的许多所谓“罪行”被否定。虽然中央在政治层面以及法律程序上没有重新审理并纠正错误，但“两案”在罪罚依据及审判程序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失误和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重新审查“两案”的阻力不单是中央高层，也来自于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和鼓吹西化的右倾势力。

既得利益集团反对“两案”重审有情可愿，因为怕政治风向改变对他们非法掠夺国家资财的清算。“西化派”们就难以理解了。本来他们布道的是民主、自由、宪政和人权，面对“两案”审判中违背民主宪政精神的行为不仅不谴责，而且尽力维护，暴露了中国许多民主人士的虚伪和丑陋。

翻案从字面上释义是推翻已定的成案，推翻原定判决、处分、鉴定、评价等。“两案”作为完成整个刑事审判程序的案件，发现错误理应启动重审并重新作出裁决。

### 一．两案审判程序不合法

文革以后，为了清算林彪、江青为首的文革派，1980年3月17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两案”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冲、江华、黄火青、伍修权、王鹤寿、赵苍璧七人组成，彭真任主任，彭冲任副主任。

彭真指示，审判指导委员会下面设审判工作小组。这个工作小组既是“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又是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彭真、彭冲决定刘复之、凌云、洪沛霖为审判工作小组召集人，成员有于桑、朱穆之、曾汉周、江文、冯基平、史进前、王芳、卫之民、姚伦、王汉斌、郝苏、王照华、陈卓、穆青、高富有，共18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特别检察厅厅长，江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曾汉周为第一审判庭审判长、伍修权为第二审判庭审判长。

黄火青在长达两万多字的起诉书中，列举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四大罪状：一、诬陷和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二、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三、谋害毛泽东，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四、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开庭宣判：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陈伯达十八年，黄永胜十八年，吴法宪十七年、李作鹏十七年，邱会作十六年，江腾蛟十八年，以上七名主犯均被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两案”如果不是公开审理，或者不挥舞法律的大棒，找个罪名把他们关起来或者打倒在

地，后世只能以当时的政治环境来认识，不会过多的追究其法律上的问题。终究那个时期中国法律不完善，很多时候还是人治大于法治。

然而当权者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正”，偏要借助于法律消灭政敌，搞了个不伦不类的公开审判。结果适得其反，留下了许多垢病。

从法律操作上，首先审判委员会成员都是被审者的政敌，开始就有政治报复的味道。其次是政客当法官，审判员不懂法律。三是选择性法律依据，包括以前的刑法，文革期间的公安六条和文革以后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四是审判并非是在司法独立的情况下进行，而是被当权者操纵。五是两案集团所有的罪行都是政治性的，所谓的犯罪事实仅仅是他们曾经说过什么话，没有行为也没有具体的罪证。六是拼凑证人证言，为定罪而设计证据。七是通过舆论干扰审判，不仅在报纸上展开大批判，而且通过庭上摄影，抓取罪犯们的瞬间，对人格进行侮辱，从而形成反面和有罪的社会氛围。八是律师与检察方面相互配合勾结，帮助法庭定罪。九是被告辩护权受到打压，只要辩解就是继续进行反革命犯罪。十是合议庭开庭名不符实，完全是按照预先制订好的口径和目标进行。合议庭不是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而是有罪推理，预设罪行，如何寻找判刑的理由。十一是政治人物站在后台操纵审判进程，法庭要向政治人物汇报和接受新的指令。十二是证人证言都证罪，被告提出的证人不让出庭。

显然，“两案”审判违反了基本的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是一次不合法和法律程序乱为的审判。

## 二．依据法律不合适

“两案”审判所依据的法律是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而罪犯们的犯罪全部是1966年到1976之间，有的罪犯已经在1971年关押。按照法律原则，对“两案”的定罪只能依据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内容分为六条，所以简称“公安六条”。然而特别法庭在宣判时公开依据十几年后才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是不公平也不合法的。

## 三．定罪理由不充分或者不合法

最终给他们定罪的依据经不起推敲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定罪中充斥着“阴谋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活动，妄图架空毛主席”。“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打倒周恩来同志和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打击和诬陷邓小平，丧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阴谋推翻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妄图使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极右派”，“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

其实，阴谋、妄图、打击、诬陷、篡改、颠倒等词语都属于政治思想上的术语，非法律惩戒理由。

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这种定性属于政治术语而非法律惩戒条款。

## 四．重大罪行缺乏证据支持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都被作为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受审，“四人帮”罪行之一也有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内容。然而所谓的政变中的证据除了道听途说和猜测推论外，找不到具体的现行行为，仍然被按律判刑。无论是林彪的所谓军事政变还是“四人帮”的民兵武装暴动，都缺乏人证和物证。一些所谓的证人证言至今大部分被否定，纯粹是专案组杜撰或逼供产生的。

## 五. 政治上的定性被中央本身否定

当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他们的反对文革言行成了功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摒弃，他们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失去了根据。毛泽东走下神坛，他们阴谋架空毛主席成了正确的代表。地富反坏右被正名，他们成了维护正确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思想成了香饽饽的时候，他们作为新老资产阶级的代表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中国进行特色社会主义，他们的右倾思想得到伸张。

纠正冤假错案，给被诬陷和错判的人平反是新时期中央领导层的历史功绩之一。不能一方面喊着公平公正给历史人物平反昭雪，另一方面继续制造冤假错案。无论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还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只要是错了就应当纠正，否则无法向历史交待。

当法治被人们了解，人权得以伸张。回头看“两案”审判，不仅不合法，不公正，而且大部分罪行都不存在，或者说是一次违背法律精神的政治审判或政治报复。

民主政治是保障公民权利得到平等实现的政治形式，是容许和宽容各种不同思潮的表达和诉求。宪政基本的要素是民主、法治和人权，这种社会权力对任何人都适用。法律如果被政治利用，就失去了它基本的公平与公正。

即使“四人帮”和林彪集团有多坏，也必须依法办事，公平公正地对待他们，这是民主社会的基本要求。

不是为翻案而翻案，而是根据案件分析是否是错案。“两案”既然走的是法律程序，就应当以法律的观点来看待。

“两案”存在着抓捕关押违法，审判程序不合法，法律引用错误，定罪依据不充分，理应重审并为之平反。

以政敌因素不给他们翻案是强权政治，是权力的乱为，是良知的丧失，是对民主的背叛，是对法律的亵渎，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目前是没有平反的平反，中央现在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这种行为容易造成社会思想的混乱，也不利于中国法治社会的建立。

正义必须以看得见的合法方式体现，任何不符合法治原则的正义都经不住历史的检验。应当重新为他们进行政治上的定性，法律上的纠错。

这不是纠缠历史，而是解开民众心中的纠结。对继承政治遗产的执政者而言，也是政治上的解套。

□ 选自作者博客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